



百年人生丛书

周汝昌 著

# 天·地·人·我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照片



15岁小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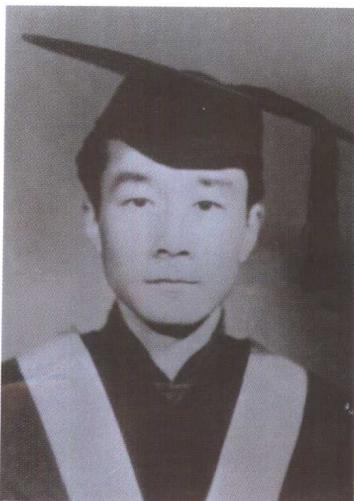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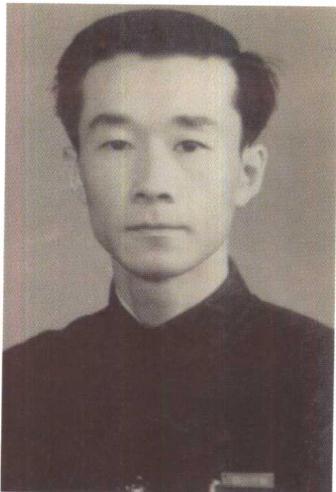
1936年 18岁



20岁小影

## 作者照片

1949年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照



1953年在四川大学任教



60年代在无量大人胡同旧居

作者照片



1940年与毛淑仁结婚照



与老伴结婚 60 周年留影  
(2000 年 5 月 19 日)



2000 年近影

 作者照片



70年代初全家合影

与祜昌四兄在恭王府垂花门  
(1989年7月19日)



## 作者照片



30年代初与黄裳（右）  
合摄于天津南开中学



1941年与张金鉴  
在燕京大学门前合影



1984年在苏联考  
察《石头记》抄本



1987年在纽约与夏志  
清（右）、唐德刚（左）合影

作者照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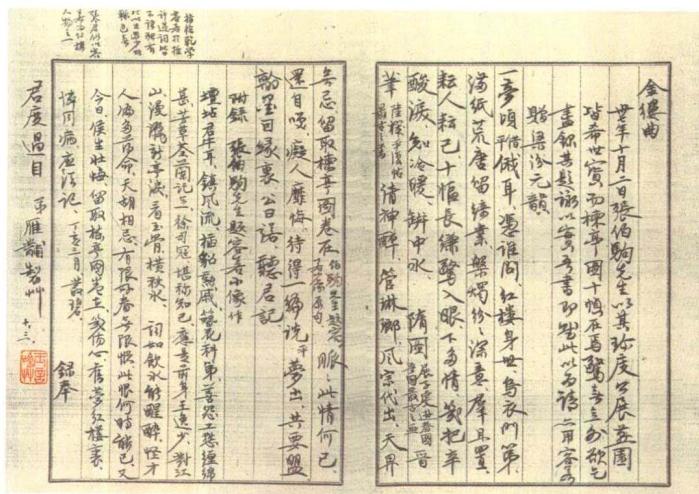


1940年在燕京大学国剧社演《虹霓关》中王伯当（右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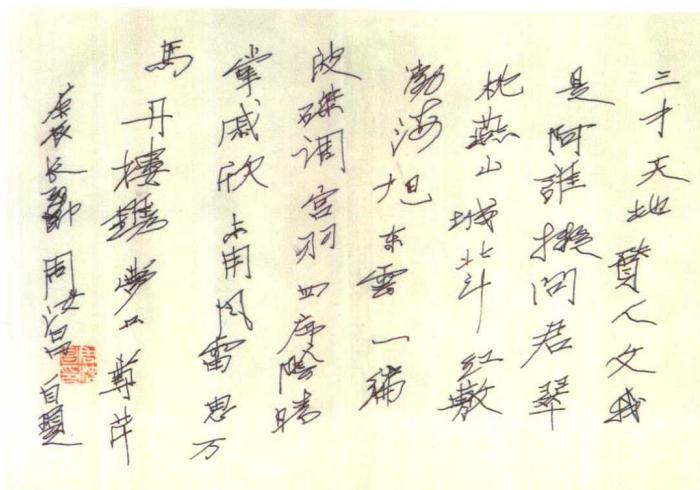


1941年在燕京大学演《春秋配》中李春发（右）

# 作者手迹



《天·地·人·我》自题诗



 作者著作





## 自序

不知缘何，人们颇喜读些回忆录性质的书。回忆者，事已成“史”，邈不可追，看它何用？况且个人的回忆，如非伟人巨匠、政要高官，那生活、阅历的圈子很有限，又有什么真正值得回忆而且值得一读的呢？我对此总觉有些疑而不解。最近忽有所“悟”：人从小孩时起就特别爱听故事，此乃天性也，没有更好的解释。那么故事者，究竟为何物也？很明白，意思就是“老时候的事情”，并无差错——至于后来把童话、神话、鬼话、编造虚构的“谎话”，一股脑儿都叫做“故事”，那无非是借用它作个泛称罢了。所以，回忆才是真正的“故事”。人们爱听，盖有由也。

您此时打开的这本书，够不上“回忆录”，只是些片断断续的小“故事”。

我非伟人要人，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或意味呢？那就在于您用什么尺码和眼光去衡量看待了。比如我小时候吃



的、穿的、用的、见的、叫的、经的、历的……没有一样是与现时相同的，一写旧事老话儿，处处得加“注”了，不然已经没人懂了。我生于民国七年，岁次戊午，而那时没人说“我生于 1918”这类的话，更没有什么“公元”的名目加在年头上。那时买东西花的钱是“银圆”和“铜子儿”（也有“铜板”之称）。老头儿很多不是光头，而是“留个帽缨子”——什么叫“帽缨子”？清帝“逊位”了，男人不再留长辫子，剪了去，脑后的那“片”头发还在，“披松”着（俗语谓随便松散、不加梳理），像清代官帽上的红缨子也。试问：这不加“注”，您懂吗？

老太太是小脚，走路时两臂的宽袖要左右挑起来“助势”而成“走姿”，或一臂扭起来，腰眼灵活，很好看。少女不叫什么姑娘小姐，称“闺女”，裹脚的还很多，一概留大辫子，那种端庄淑静的气质很美——没有“满街跑的”（此为讥笑女孩子的话）。

家常生活用具是木器与铜器居多。铜器今已绝迹久矣，那时脸盆、火盆、手脚炉、茶壶、家具箱匣上所有“四眼”、蜡扦、佛前的磬、锁钥……处处是铜的。

衣服鞋袜，都是“家做”，妇女一针一线苦工所制，有钱的城里人才到鞋店、衣店去买。袜子中老年人还多是布缝的，“时髦”的才穿“洋袜子”——是线织的，不禁磨，很快露出大脚后跟，谁也没财力几天换一双新的，得用布补——补得不好极难看！可真是个大烦人的事……

这些，说三天三夜也完不了，不“回忆”怎么行呢？——什么叫“历史”？难道就是些朝代名、地名、人



名、事件名……吗？那有什么好看、好听的？

这么一说，我这琐末的“故事”，竟然也会“有趣”了。

“看官”读我这片段的故事，就会发问：此人到底是个何等样人？总得有个大概的“定义”、“定位”、“定品”才是。我也时常自问：我是何如人？这回答又易又难。易，只一句话：书呆子也。难，比方就看完了这本书，也未必说得清是一个什么样式的书呆子，有何特点？有自己的人生观吗？理想何在？毛病缺陷都是怎样的？这就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”了。

只说人生观吧。明朝的书画大名家唐伯虎（寅），人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可是他自号“六如居士”，这是何所取义呢？大约是《金刚经》的典故，那个偈语很有名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六如者，此也。

更妙的，是传闻沪上已故名画家某先生曾藏有一件石雕水盂，镌有“二如居士”之款识，传者谓是曹雪芹遗物。若然，这可巧极了，雪芹堪膺“江北第一风流才子”的荣号，他也明白六如的意思并从而翻用变用之——“二如”者，如梦如幻也，正是《红楼梦》卷头“作者自云：曾经历过一番梦幻”的注脚了！

两大才子，他们真的将人生“参透”，视为“六如”、“二如”了吗？我怀疑。比方雪芹若真看破了尘世一切，诸相皆空，那他绝不会再“滴泪为墨，研血成字”地去写什么“红楼”之“梦”。

梦，假名也。此梦指的正是真，是实，绝非虚无飘渺也。

我引来这些，是为了表明，我不以为我回忆的人、物、事、境都已成“梦”。不然，都很真实，历史永存。

这种不承认梦幻虚实的死硬脑筋，在佛家看来就叫做“痴人”，执著人生，痴迷不悟——不觉(jiào)不醒之义也。而在世间，这也就是书呆子气了。因为对人生太认真。

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“只会抱书本”、“纸上谈兵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他事事“看不开”、“想不通”，人家早已明白奥妙、一笑置之的事情，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、计较——还带着不平和“义愤”！旁人窃笑，他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。

书呆子的另一“特色”是十二分天真，以为世上没坏人，没心地险恶的卑鄙小人，没专门损人利己的无道德无情义的人——更以为世上没有假文人、假学者，没有借了“学术”去招摇撞骗、到处捞名取利的人。他遇上这种人，不识别，还以为可与深交，结果让人家利用了之后，再以打击攻击贬抑排挤为“报答”。

书呆子谁写得最好？我推文康在《儿女英雄传》里写安公子安龙媒（骥），这傻瓜因父遭受诬难，带了银子远行赎救，丝毫不谙世途人心之险厄，老仆华忠的谆谆嘱咐是：“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交一片心！”于是他牢牢记住——等到十三妹何玉凤问他带了多少银子时，他就按实数算出“三分之一”来向那不识面的女子“报账”。这简



直写尽了书呆子的一片“老谋深算”和煞费苦心。

但我无法与人家公子相比，我一见了人，就忘了“三分话”的忠告，却总是倾心吐胆，一片心全部交出。人家一听便知：这倒是个傻瓜，好对付；心里早已有了盘算：今后如何来“使用”之。

书呆子之可笑如此，可怜亦如此。

幸而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古语云：傻人自有傻人福。我也有“福”。这“福”就是到处有好人暗中护念扶持——算命的常说，“犯小人”，“有贵人”，似乎真有此理。我既犯小人之忌，又得贵人之助。这也可谓“得天独厚”了，还不该“知足常乐”乎？

回顾大半生，求学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三阶段因战乱、沦陷，失学废学共计十余年，挣扎到大学毕业，已年华老大，别人无此例，多少不同班次的同学都已功业成就了，我是个最不幸者。但我学业成绩好，从高中起，凭奖学金上学，没花过家中什么钱（一个破落的旧式大家庭）。再说就职工作，也很奇特：都是人家找到我，而不是我的努力求职所致。平生工作三大阶段：一高校教书，二出版社编辑，三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，都不是我自己去求职的。有特聘，有特调，有商请。我若说自己耻于钻营谋求，就会有自夸之嫌；如谓自己根本不会钻营奔竞，则并无任何嫌疑可言。

例如，在大学做“自助工作”（即今之“打工”是也），是外国研究生找我，帮他（她）们读古书。到华西大学去教翻译，是因一篇英文论文的“因缘”特电来聘。



到人民文学出版社，是冯雪峰请中宣部特电川大调京。入中国艺术研究院，是因友人一句话相邀而成议的（我双目损后，协和医院主治大夫张承芬女士，三次主动给我开出证明书，说再不可做编辑工作了。我还是并未辞职，社方也并未“处置”我。我仍想回高校教课，亦未定。适胡文彬先生来访，对我说，还是进研究院，和我们在一起吧！因此这才决定调职的——笔者附注）。

再例如，出版著作也不是我去求人，皆是友人主动办理或出版社来索书稿。

我在患难、险困中，总有好人予以暗中的呵护帮扶。遭到无端的诬谤攻击，其势汹汹，又总有正义之士代为抱打不平，说几句公道话或揭示真相。

所有这些，还不是“贵人”是什么？如以为那是迷信，则可以不用彼语，就讨个自大，说是“吉人天相”，大概也还使得吧？

自己为人脾性有毛病，有怪癖。因为实在很多，难以尽举，况且亦难与人言、不便昌言者，故只随手记其数端，豹斑鼎脔，又何必求益求全乎？

不知为何，我极惜纸，怕看见人糟蹋纸。自己有纸也舍不得使，破纸条、包物纸，都存着“备用”。张中行先生撰文写我，说我写信用的纸都是大小破烂的纸片，就说 I 这么“不在乎”整洁，是“六朝人物”（此外他写我耳目皆损之可笑，比如咫尺间不识对面谁何，比如打雷也如无所闻，别的就没什么可言了）。

我又极爱汉字，看见破坏、丑化、作践汉字的现象，



都很难过，认为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不幸。特别喜爱民间无名（不留姓名）的良工巧匠，手工玩具，年画，灯彩，鼓乐，盖庙的，塑像的，壁画的，刻木的，雕玉的……都是大师，都比文人可爱可珍，我简直是崇拜他们——也替他们抱屈。

我不是“宰相”或权位者，说自己“爱才”有点儿不太对劲儿，但我实是惜才重才——见人有一善一长，也心喜意惬，愿为之揄扬说项。因此给人作序，写评职称的鉴定，甚至调工作的请求信件，写信，倡和……绝不自惜一点儿力气心血。为此，有时朋友评我热心太切，往往称赞过高，惹人讥议，劝我加慎，宜识人辨品。其言极是，可我终难改过。给一些人效了劳，他们过后如陌路人，连个纸片也不肯回赐了。这也是我的“报应”吧？

我很乐意为人解困分忧，也救过人的命<sup>①</sup>。“不干己事休开口”，怎么“自责”也办不到。因此得罪人，也受报应。更不幸者，当然也会遇上“中山狼”一类可怕的人物。

以上，都是书呆子的脾性，可为明证。

我崇拜中华文艺史上的“三圣”：书圣王右军，诗圣杜少陵，稗圣曹雪芹。此外也顶礼“二山”：晚唐诗人李义山（商隐）与北宋词人晏小山（几[兀]道）。

我酷爱美玉，酷嗜民族音乐戏曲。

除了咬文嚼字、弄笔掉文，我什么也无能为，也不会

<sup>①</sup> 参看《水寨奇遇记》篇〔附记〕。



做。“生活不能自理”，十足的废物一个。我坚信今后的时代社会，绝不会再出现我这样的人了。

诗曰：

一介书生总性呆，也缘奇事见微怀。  
岂同春梦随云散，彩线金针绣得来。

写于庚辰七月中元节前